第一部分　理论概述

1688 年标志着英国历史上一个剧烈动荡时代的结束，英国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历史发展时期。到 1783 年，英国迈入了波澜壮阔的工业革命时期。 1688—1783 年这一时期的英国正发生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对 1688—1783 年英国社会结构的分析可以置于 16—18 世纪研究的大背景之下展开。文化学派、文明学派、商业学派、人口学派、社会形态学派、全球学派、原工业化学派、产权学派从不同的角度对 16—18 世纪的历史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们的研究成果成为本书的写作起点。

从广义上讲，社会结构反映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基本范畴之间稳定联系的总和，是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方式有序排列的总和。从狭义上讲，社会结构这一术语是用来标示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集团和各集团之间稳定联系的体系，揭示的是不同社会的内部结构。研究社会结构的重点不仅仅要关注各个社会集团本身，还要分析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联系，分析他们如何形成一个整体。

社会结构的划分经历了一个缓慢的演化过程。金、笛福、康替龙、纳尔逊、马西、斯密根据自己的亲身观察对当时的社会结构作出了自己的划分。在他们的眼中，三层式社会结构已经初现端倪。

有关社会结构的研究既要回答社会“由何构成”，又要回答社会“如何构成”，揭示社会系统中诸要素的联结方式或互动关系。本书分析的是两类层次的社会结构：一类是社会结构各种要素的内部结构及其演变，另一类是社会结构诸种要素的有序排列，进而形成稳定的联系，也就是说，本书需要同时分析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整合，这成为本书的研究视角。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绪　论

社会结构可以揭示社会的本质特征，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与生产关系的互动关系。社会结构一直是人们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研究社会结构不只是了解构成社会的要素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认识社会诸要素是如何互相联系起来的，即这些要素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结方式或互动关系。人们力图如实地揭示社会各要素在社会结构中的特定位置以及它同其他要素的关系，力求从中寻找社会演变的原因。研究社会结构也是为了认清各个历史时期的结构模式，找出其发展变化的特征，把握历史演变的方向，这一直是历史学家孜孜以求的目标。与此同时，研究社会结构及其演变的历史也有助于探索社会发展变化的奥秘，并作出历史的解释。

社会结构要素间的冲突会引起社会分化和整合，对它的研究有助于人们认识社会如何才能保持向前发展的活力。社会结构内部的冲突和社会要素数量增减及功能转化会引起社会出现分化。社会整合的力量会对社会分化产生影响，使社会结构保持稳定，一旦社会整合不能实现，社会分化就会加剧社会的无序，甚至发生质变,导致社会崩溃。

第一节 16—18 世纪研究的文献回顾

本书所考察的是英国社会结构在 1688—1783 年发生的演变，1688 年标志着英国历史上一个剧烈动荡时代的结束，英国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历史发展时期。到 1783 年，在英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工业部门所占的比重首次超过农业部门,英国迈入波澜壮阔的工业革命时期。从表面上看,1688—1783 年这一时期的英国历史似乎是一段无事之秋，实质上，它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对 1688—1783 年英国社会结构的分析可以置于 16—18 世纪研究的大背景下展开。1500 年前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以及其他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偏隅欧洲西北角的部分地区加速发展，世界均势被打破，人类文明发展呈现出新的格局，其主线是迅速拓展人类活动的场域，民族国家先后出现，国际市场容量扩大，国内市场各部分之间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到 1783 年，英国首先迈入工业社会。因此，对欧洲而言,1500 年前后至 1783 年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

根据马克思按照生产关系变化的划分标准来看，人类社会的历史可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按照生产力变化的划分标准来看，人类社会可以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从传统意义上来看,16—18 世纪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这一论断揭示了社会变革中生产关系的变化。而按生产力变化的标准来看，这一时期出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对这一社会转型时期的研究是分析人类历史的重要任务之一。

长期以来,各派学者对 16—18 世纪的历史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他们的解释大相径庭,即使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也分歧竞鸣,很难

取得一致意见。根据相关学者研究方法、研究重点以及得出结论的差异，这些研究大致上可以划分为文化学派、文明学派、商业学派、人口学派、社会形态学派、全球学派、原工业化学派、产权学派几种类型。他们的研究成果成为本书写作的起点。

文化学派

这个学派的主要论点是，人们精神和观念的变化是社会发展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都表现为文化。但是，对文化的具体研究，文化学派内部又是人言言殊。

1902 年，桑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每一种社会都有与其他社会相区别的心态或一整套对问题所持的态度和看法，现代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技术组织形式，它还具有一种资本主义的精神。他的结论是："我们对于那由企业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组成的一个统一的心态称为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了资本主义。"[①]韦伯在稍后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以更广阔的视角进行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展开讨论。他指出："资本主义精神"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这一术语"所适用的任何对象都只能是一种在历史实在中联结起来的诸要素的复合体，我们是按照这些要素的文化意蕴而把它们统一成为一个概念整体的"。[②]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③]。贝尔认为，资本主义"这种独特的新式运转模式牵涉到一种独特文化和一种品格构造。在文化上，它的特征是自我实现，即把个人从传统

① 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 1958年版，第 215 页。
②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32 页。
③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 49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束缚和归属纽带(家庭或血统)中解脱出来,以便按照主观意愿‘造就’自我”。[①] 麦克法兰在《资本主义文化》一书中提出,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而且是一种影响生存的物质、社会、家庭甚至精神基础的文化。[②] 在肯定‘资本主义精神’的同时,这些学者都不否认其他因素的作用。

在历史分析中,有些人往往认为文化因素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学术界历来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角度 其一强调经济基础等客观力量是第一性的因素;其二强调文化和思想等主观因素的主导作用。尽管一部分历史著作一直坚持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我们也不能否认文化之类因素对经济、对历史所发挥的作用,但问题是,世界上的事情不能单靠精神文化来说明。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与文化的关系更加难以捉摸,因为反差十分明显 文化同时是支撑和挑战,传统和反抗。……文化几乎每次都转而保护现存秩序,资本主义的安全可以说部分地有赖于文化”。[③] 这样的论述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由此看来,文化学派的解释尽管深奥,但显得过于单薄。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看到;‘韦伯不只是深化了

① 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年版,第 25 页。

② 麦克法兰:《资本主义文化》(Alan Macfarlane, *The Culture of Capitalism*),牛津 1987年版,第 223 页。他的《英国个人主义的兴起、家庭、财产和社会转型》(*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 the Family, Property and Social Transition*)也是这方面的一本重要著作。葛兰西对‘个人主义’有一段这样的解释 关于所谓“个人主义”的问题,也就是关于每个历史时期对于个人在世界和历史生活中所处地位所采取的态度问题 今天被称做‘个人主义’的东西,起源于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所发生的文化革命,这种‘个人主义’的东西表明了对于神并从而对于教会问题所采取的一种特定的立场;这种立场是从超验思想到内在论的过渡。那就是一种在历史世界本身中寻找支配历史世界的原则,而不求助于任何外部哲学原则或动机力量的思维形式。参阅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74—275 页。

③ 布罗代尔《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726—727 页。

资本主义起源的争论，他提出的问题并不局限于西欧，宗教文化问题不仅是欧洲史研究的一个难题，而且是世界史的难题，由此韦伯对严肃的学者提出了挑战”。①

文明学派

文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布罗代尔。布罗代尔对 15 至 18 世纪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把这期间的经济活动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最基层，涉及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第二层是市场经济，即生产与交换的机制，通过低级和高级的“交换齿轮”沟通生产与消费，调节供求关系，把越来越多的人和地区纳入经济活动之中，使他们为获取自己的利益而进行必不可少的交换，竞争是其最基本的特征；第三层是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由少数商人组成的垄断经济。“资本主义是一种长时段的结构，但这不等于说是一种绝对静止不动的实在。所谓长时段，就是一系列的反复运动，其中包括变异、回归、衰变、整治和停滞，或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构成、解构、重构……资本主义从变化中吸取养料，随时准备根据外界的条件而扩大或缩小自己命定的活动范围。”②布罗代尔的《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卷的标题分别为：《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形形色色的交换》和《世界的时代》，布罗代尔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建构了一部资本主义诞生的历史。在地理区位上，布罗代尔将全世界划分为四个“经济世界”，它们同时并存，相互进行有限的交往，各个“经济世界”的地理范围可以扩大或缩小。与此同时，布罗代尔认为，城市和乡村两个经济活动领域的关系极为重要，经济活动表现为从乡村到城

① 格林：《历史、历史学家和历史发展动力》（William A. Green, *History, Historians and the Dynamics of Change*），韦斯波特 1993 年版，第 123—124 页。

② 布罗代尔：《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第 722 页。

市、再从城市到乡村、最后重新整合的发展过程。

尽管布罗代尔这套书的基线‘原则上偏重历史的一个门类‘物质和经济的历史’[①]，但经济和物质这两种因素其实是千百年演变的结果。15至18世纪之间的物质生活是以往社会和经济的延伸。文明学派的研究显然具有整体性，正如布罗代尔所说的：‘我采用的方法，是在描述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描述经济文明（姑且这么称呼）。后者与前者相辅而行，既干扰它，又在对立中说明它。’[②]此外，布罗代尔从熊彼特等人那里为自己的研究方法寻找依据，如，经济史不能只谈经济‘经济学家如果不走出经济的圈子，就不能充分掌握经济事实’与其他社会科学相割裂，这对政治经济学来说是不允许的‘历史研究的领域应包括整个社会体系，它涉及到社会的一切。这样，布罗代尔在文明和成千上万乍看起来互不相关、五花八门的文化之间建立起联系。

但是，正如有些批评者所言，文明学派的研究属于‘印象派’，缺乏完整的社会理论体系，过分关注具体事物，不善于驾驭非物质现象，忽略了事件的作用等。[③] 还有人批评布罗代尔“不重视生产与生产关系，只重视交换与流通‘不重视农村与农业，只重视城市与商业‘不重视技术与分工，只重视贵金属与信贷的作用”。[④]

商业学派

商业学派认为，市场的力量决定农奴制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商业是欧洲生活变迁的引擎，……欧洲文化基本上是

①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第3页。

②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第26页。

③杜比：“法国历史研究的最新发展”，《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

④ 张芝联：“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第26页。

商业的产儿。’[①]商业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皮朗,其代表作有《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和《中世纪的城市》。皮朗提出,“商业和工业最初从没有土地的人们中间获得发展。这些人在以土地为惟一生存基础的社会里,可以说,是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最初的推动力来自外界,……凝固于农业文明中的西欧,倘若没有外界的刺激和范例,是不能如此迅速地习惯于一种新的生活”。[②] 对社会发展来说,“远程贸易是推动的力量”。斯威齐为皮朗的旧说披上新装,他说封建庄园经济是为“使用而生产”的体系,城市经济是为商品而生产的体系,商品生产和封建制度是互相排斥的概念。

这一派往往强调城市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他们把城市看作经济进步、文明开化的动力,而把乡村看作传统保守势力的地盘,认为城市在向近代社会的转变中居于主动地位,而乡村则处于被动地位。实际上,城市和乡村之间相互提供服务:乡村向城市提供粮食等产品,反过来城市为乡村供应某些产品。20 世纪的许多学者指出:城市并不是一种独立自存的社会实体,它与城市之外的世界、与周围乡村、与更大的国家等有着紧密联系,是更大范围体系、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城市是某一特定社会的城市,城市并不是一个与外部世界分离的实体,而是与其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应从联结城乡于一体的整个经济社会结构上加以认识。由“城市论”向城乡一体论的转变反映了人们对历史认识的逐步深化。[③] 马克思强调,商业“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④] 看来,商业学派所

① 格林:《历史、历史学家和历史发展动力》,第 54—55 页。
② 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1、43—44 页。
③ 马克尧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25、230、245 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71 页。

提出来的市场决定资本主义的兴起这一说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人口学派

人是组成生产力的一个要素，人口增长也就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但人口增长又对社会提出了许多新需求,形成人口压力。在社会经济的变化中，人口因素是任何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都不能忽视的问题。从人口角度对 16 世纪到 18 世纪历史进行解释的代表人物是拉杜里，他的理论是波斯坦模式的翻版。波斯坦的人口理论通常被称为“ 波斯坦模式 ”,波斯坦所研究的发展诸因素包括土地、人口、工资、物价、地租等,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人口因素。波斯坦建构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是人口。他认为，人口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所以他被人称之为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他的理论是典型的人口决定论。但是波斯坦对此予以否认,他强调自己的研究更广泛、更开放,并不局限在人口方面。

拉杜里所研究的 16 至 18 世纪的历史重复了波斯坦的“ 两个阶段的模式 ”,即第一阶段是 16世纪的人口增加与租金上升、工资下降和农民持有地的分解；第二阶段是急剧下降的生产力导致 17 世纪人口的大灾祸。拉杜里认为他的“ 两个阶段的运动 ” 适用于 16 世纪和 17 世纪，他所说的第一阶段实际上指 1450 至 1650 年这一时期，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人口和地租上升，一度增加的中等“ 自耕农 ”特有地到 16 和 17 世纪上半期趋于减少，大地产增加。第二阶段(约 1650 年至 1720 年)则出现人口和地租的减少与生产力的下降。① 另外,有人认为诺斯过分强调了人口的作用,诺斯起初认为，人口增加及其对市场需求的刺激对经济增长发挥了中心

①张云鹤:“ 西方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新讨论 ”,《世界历史》,1980 年第 6 期。

作用，后来强调必须有国家中介作用保证向资本主义过渡。① 实际上，大多数人都接受这样的观点：人口运动与物价、工资和地租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存在一种平衡机制。②

人口学派是在对商业学派的批评中产生出来的，波斯坦和拉杜里等人主要以对人口的分析来代替对商业变化作用的过分强调，他们赋予人口因素以太多的重要性。我们应该看到，人口增长的确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如果因此认为人口增加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未免言过其实。难怪有人说："单因素的解释过于狭窄，不会有多大作用。例如，一味强调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③熊彼特指出："认为历史发展过程的关键在于人口的变化虽然是片面的看法，但比起任何其他出于偏见的历史理论，亦即相信总会有一个推动社会或经济前进的单一的、主要的因素——例如技术、宗教、种族阶级斗争、资本形成等等——至少是同样有道理的。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人口问题在经济分析工作一开始就受到注意，在我们所讨论的时期所有主要的经济学家的思想中都赫然耸现。"④人口因素是解释历史的一个因素，它是否适用于对前工业社会的研究还值得讨论。

社会形态学派

在研究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的著作中，特别是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形态》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社会形态发展的理论。许多学者运

① 马克尧："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检讨"，《历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

② 哈巴库克：《1750 年以来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H. J. Habbakuk,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750），莱斯特 1972 年版，第 17—20 页。

③ 科尔曼：《1450—1750 年间英国经济》（D. C. Coleman, *The Economy of England* 1450—1750），牛津 1984 年版，第 3 页。

④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379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剖析 16—18 世纪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围绕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封建主义”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生产方式,而不是过去所认为的封君和封臣之间的司法关系,它还可以被视作一种具有财政性质的契约关系。“封建主义危机”这一说法最初是布洛赫于 1929 年至 1931 年之间提出来的。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反映的是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交换关系;还有人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生产方式以及一种文明;也有学者侧重从交换关系来定义“资本主义”。马克思精辟地总结出:“从封建生产方式开始的过渡有两条途径。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而与农业的自然经济和中世纪城市受行会束缚的手工业相对立。这是真正革命化的道路。或者是商人直接支配生产。”① 因此:“对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研究范围不可避免地要由对农业的研究扩大到对经济各领域以及对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领域的研究。研究领域和视角的选择其实是由研究者对那个主题的理解和把握决定的。”② 有人强调,经济结构是制约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速度与方向的力量。布伦纳所关注的则是阶级结构,他认为,正是农村阶级结构的转变使英国农业生产力增加,从而免除了过去的危机重现,英国变成经历工业化的第一个国家。③ 社会历史是随着劳动者的自主活动能力的发展而发展的,这必然要相应地形成新的社会结构。

诺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提出了挑战,他在书中写道:“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十七世纪是辩证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大难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 373 页。

② 沈汉、王建娥:《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7 页。

③ 布伦纳:“前工业欧洲农村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世界历史译丛》,1980 年第 5 期。

题。因为封建主义似乎到 1500 年已经灭亡，而在传统上与工业革命有关的资本主义，在几乎近三个世纪中并没有出现。……所以马克思主义者有三个世纪的空白。'但他同时又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所以是目前对长期变革最有力的论述，恰好是因为它将新古典框架舍弃的全部要素包括在内：制度、所有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之强调的所有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现存所有权体系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紧张关系大发展的观点，堪称是一项重大的贡献'。① 还有人提出了另外的问题："现有讨论资本主义出现的著作忽视了两个重要方面。第一，它未能建立前资本主义和过渡生产关系的直接模式。第二，它没有系统分析以前以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形式存在的资本进入生产领域的原因。'②

总体上来说，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历史学的贡献怎么说都不为过分，他们的很多分析都被专业人士广为接受，这是任何其他理论都无可匹敌的。但是，"社会形态学派研究的重点仍然是经济领域而且局限在农业中，……对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的问题更没有触及，表现出一种脱离和忽视政治研究的倾向。这种研究视野上表现出的倾向具有片面性。"③这一评述比较中肯。这一学派的研究常常建筑在已有概念的基础上，那些长期使用的概念过于陈旧化，使得这类研究在目前阶段的有效性受到人们的质疑。这些概念往往带有时代局限性，它们与

①诺思（此处为该书译者所译，与本书翻译的诺斯不同）：《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第 144、61 页。

②克里特、麦迪克、施吕勃姆：《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资本主义起源中的农村工业》（Peter Kriedte, Hans Medick, Jurgen Schlumbohm, *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 : Rural Industry in the Genesis of Capitalism*）剑桥 1981 年版，第 94 页。

③沈汉、王建娥：《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研究》，第 5—6 页。

当时的社会时代相联系。这些概念需要经过改造才能被用来进行研究。

全球学派

在西方学术界，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已经形成一个学派，他们的共同点是把整个世界而不是把单个国家作为自己的研究单位。这些人中成绩卓著的是沃勒斯坦,他的代表作是《现代世界体系》。

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文版序言中指出：该书讲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即现代世界体系的起源与历史发展。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历史体系，16 世纪开始以西北欧为中心形成“世界性经济体系”，后来扩展到把世界其他一些地区也纳入其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地域上已扩展到整个世界”。① 沃勒斯坦主要是从交换关系来展开研究，他认为外部力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资本主义不是在单个国家孤立地出现，而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出现，它由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联结成一个整体结构，自成网络，不同的组成部分承担着不同的经济角色。三种不同的经济角色由不同的劳动分工所决定，三种角色缺一不可，变动不居是现代世界体系的根本特征。沃勒斯坦认为，对建立现代世界体系具有决定意义的三个因素是地理规模的扩张、劳动力管理方法的发展变化、某些地区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建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发展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由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② 人们大多承认《现代世界体

①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第 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 51 页。

系》是一部不能忽视的名著，“提出了一系列宏阔而锐敏的独特观点”[①]。但有人提出，将“世界体系”与民族或国家作为研究的单位，这二种方法都不能偏废。[②]

近年来，西方兴起的环境史学也从全球的角度进行考察。环境史学把气候、人口、疾病、食物、自然资源和自然灾害等一系列因素综合起来研究。传统史学只关注与人有关的活动，认为自然环境是一成不变的，环境为人类活动提供了一个稳定而巨大的舞台。环境史学家提出，事实并非如此，自然环境始终变动不居，人和自然互相作用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早期的人类是环境的囚徒，人类的大部分历史得由环境来决定。[③] 环境史学无所不包，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可以精通这一学科的每一个方面。环境史学把我们的视野提升到另一个层次——超越了商业、阶级、人口分析。[④] 环境史学所研究的都是全球性的问题。

这一学派虽然对历史研究作了有益的尝试，但对生动活泼的人类历史往往语焉不详，给人以遗珠之憾。有人对沃勒斯坦的理论这样评价：“与其说他的模式解释了资本主义是如何产生的，还不如说它成功地说明了现代早期资本主义是如何跨越时空发挥作用的。”[⑤]

①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庞卓恒撰写的“中译本第一、二卷序”，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 页。

②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庞卓恒撰写的“中译本第一、二卷序”，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 页。

③沃斯特：“脆弱的地球：走近地球史”（Donald Worster，The Vulnerable Earth：Toward a Planetary History），载于沃斯特主编《地球的终结：现代环境史学面面观》（Donald Worster ed. ，*The En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纽约 1988 年版，第 4 页。

④ 格林：《历史、历史学家和历史发展动力》，第 185 页。

⑤ 格林：《历史、历史学家和历史发展动力》，第 161 页。

原工业化学派

多布曾经提出,在 15—16 世纪封建生产方式开始解体和 18 世纪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这两个时期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时期。[①] 这就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以交换为目的、为市场生产的农村工业的发展。这一现象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学术界有人由此提出了原工业化理论。这种理论把资本主义工业化以前农村工业的发展称为原工业化过程，强调它是工业化的第一阶段[②]或"工厂制度之前的工业化"[③]。随后,更为完整的原工业化理论把传统的原工业化理论发展成为欧洲从中世纪到 19 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模式 原工业化是"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可以界定为农村地区大部分人口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靠为跨地区、跨国界市场大量生产工业品的发展模式。从长时期来看，它是属于欧洲从封建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大变革。[④] 现在看来，尽管原工业化是否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仍存在着争论，但原工业化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则不容置喙。原工业具有三个特征：它为本地区之外的销售和出口市场生产；它最有意义的方面是为乡村提供了就业；原工业与地区性商业化农业共生。原工业化打破了传统的人口调节机制，导致人口增长和土地边缘化。它创造的利润成为工厂工业化的资本来源，并为工业化提供了技能和经验，引发了农业部门的商品化生产，这使得城市化和工厂工业

① 多布:《资本主义发展研究》(M. Dobb,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纽约 1946年版,第 18—19页。

② 门德尔斯:"原工业化 工业化的第一阶段"(F. Mendels, Proto-Industrialization: The First Phase of Industrialization),《经济史评论》第 32 卷(1972 年)。

③ R. 蒂利、C. 蒂利："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欧洲经济史议题"(R. Tilly and C. Tilly, Agenda for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in 1970s),《 经济史杂志》第 31 卷(1971 年)。

④ 克里特、麦迪克、施吕勃姆:《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第 6页。

化可能随之出现。[①] 现在，原工业化概念已经演变成了一个不同理论的集合，原工业化理论几乎涉及到前工业社会的每一个方面，它对历史作出了整体性的概括和抽象，并提升到理论认识的新高度。

原工业化理论不只是简单地揭示过去发生的历史事实[②]，它还是一种对人们熟悉的一些事实重新进行解释的历史研究方法。原工业化理论的推出是历史研究中的一种“旧事新解”。原工业化理论意识到西欧工业革命的发生必须以对传统社会的改造作为前提，而传统社会的主体就是乡村，因此，关注乡村的社会经济变动显得尤为重要。原工业化概念的提出逾越了经济史、社会史等各个领域中长期存在的樊篱，它将工业史和农业史等融为一体，突破了经济史和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障碍。原工业化理论假设所具有的跨学科本质使它在实际运用中具有坚实的基础。[③] 原工业化理论在广阔的背景下对具有相似性的现象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在不同的地区间进行了富有成果的比较。

也有不少学者对原工业化理论持怀疑态度，认为它不具备普遍意义，例如，豪斯顿和斯奈尔就指出：“原工业化只是一种特例，充其量只是限于西北欧的某些地区，否则就难以解释中欧和东欧为什么迟缓迈入工业化进程的事实。”[④]科尔曼撰文“原工业化：一

①门德尔斯：《原工业化：理论和现实总报告》（F. Mendels, Proto-Industrialization: Theory and Reality, General Report），第八届国际经济史大会论文，布达佩斯 1982 年版，第 77—80 页。

②克拉克森：《原工业化：工业化的第一阶段？》（L. A. Clarkson, *Proto-Industrialization: The First Phase of Industrialization?*），伦敦 1985 年，第 10—11 页。

③ 奥杰尔弗·塞曼主编：《欧洲的原工业化》（Sheilagh C. Ogilvie and Markus Cerman (ed.), *European Proto-Industrialization*），剑桥 1996 年版，第 37、51、66 页。

④豪斯顿、斯奈尔：“原工业化？乡村工业、社会变迁和工业革命”（R. Houston, K. D. M. Snell, Proto-Industrialization? Cottage Industry, Soci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历史杂志》第 27 卷（1984 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